

# On Conceptual Metonymy Represented Across Two Languages

HUO Mingjie

Guangz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February 15, 2022

Accepted: May 23, 2022

Published: June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HUO Mingjie. (2022). On Conceptual Metonymy Represented Across Two Language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2), 106–113,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2.013>

*The research project entitled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Rewriting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ongloumeng” is supported b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gram of Guangdong Office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No. GD17XWW18.*

**Abstract:**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is conceptual. But it i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by means of language.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metonymy of one single language and its target domain is not express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conceptual metonymy, this paper studies some translations and argues that translating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metonymy, so metonymy can be cross-linguistical represented. That is, the source domain and target domain can belong to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source language respectively. Cross-linguistically represented metonymy belongs to conceptual metonymy.

**Keywords:** conceptual metonymy; cross-linguistical representation; translation approach; translating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UO Mingji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跨語言表征的概念轉喻

霍明傑

廣州大學

**摘要:** 認知語言學視域下,轉喻是概念性的,但概念轉喻的表征常常借助於語言。已有研究對轉喻的使用和理解的討論大都局限在單一語言中,且轉喻目標常常無語言表征。基於概念轉喻的運作機製,從翻譯結果反觀翻譯過程,可以看到,轉喻之施喻行為可以發生在一些翻譯過程之中。轉喻的源域和靶域用兩種不同語言的表征:源域用譯語表征,而靶域用原語表征。這種轉喻可稱為跨語言表征的概念轉喻。這種體現為譯者翻譯策略的認知方式,是概念轉喻的一種特殊形式。本研究屬於基於翻譯的認知語言學研究。

**關鍵詞:** 概念轉喻; 跨語言表征; 翻譯策略; 翻譯過程

**基金項目:**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學科共建項目「《紅樓夢》英譯改寫的認知研究」(編號: GD17XWW18)的階段性成果。

## 引言

轉喻曾被視為語言層面的修辭格。上世紀 80 到 90 年代,隨著認知語言學對概念隱喻研究的深入,轉喻作為一種認知機製引起學界關注。近年轉喻研究進一步被推向新的高潮,成為認知語言學研究熱點之一。國內外不僅有大量論文發表,還陸續出版了一些高質量有影響的論文集和專著,如 Panther & Radden (1999)、Barcelona (2000)、Dirven & Poring (2002)、Panther & Thornburg (2003)、束定芳 (2011)、Ruiz de Mendoza & Campo (2002)、張輝、盧衛中 (2010)、Littlemore (2015)、張焯焯 (2020) 等。縱觀這些研究,對轉喻的使用和理解都是基於單一語言進行的。比如:

- 1a. It is a scene no pen can finally describe.
- 1b. The White House made no comment.
- 1c. 她嫁給了金錢。
- 1d. 陳醫生明天上午有刀。

對於(1a)和(1b),言者和聽者通常對「pen」和「The White House」的使用和理解通常會自然地識別轉喻目標,即「writer」和「American Government」。而(1c)和(1d),言者和聽者通常對「金錢」和「刀」的使用和理解通常會自然地識別「有錢人」和「手術」對於這些表達中的轉喻,言者和聽者很可能是單一語言使用者,自然地以該語為媒介對該轉喻加以使用和理解。同時,這些轉喻中,轉喻目標並沒有呈現為語言形式。這是常規的轉喻研究的情況。然而我們也註意到以下翻譯現象:

- 2a. I am not a smoker.
- 2b. 我不抽煙。
- 2c. 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不想步入院中,鴉鵲無聲。
- 2d. Pao-chai walked on alone to Happy Red Court ... To her surprise, the court was utterly quiet. (楊憲益、戴乃疊譯)

例(2a)中,「a smoker」(抽煙者)被譯為「抽煙」。在概念上譯文用「行為」表述了原文的「行為者」。例(2c),「鴉鵲無聲」被譯為「utterly quiet」(寂靜),原文是譯文的例示,屬於「具體與抽象」的關係。

這種現象從認知上該如何解釋,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話題。本文擬在簡述轉喻的運作機製的基礎上,考察某些現有的翻譯現象,通過對比原文和譯文,反觀其翻譯過程,看二者是否形成了轉喻關係,從而探討這種翻譯過程中的思維方式。

### 一、概念轉喻運作機製簡述

用轉喻來說話和思維是人們日常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轉喻的運作機製,不同學者甚至同一學者



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論述。Lakoff & Johnson (1980) 認為轉喻是一種概念現象 Lakoff (1987) 進一步指出轉喻是一種概念組織方式, 是「理想認知模型 (ICM) 的一種類型」, 並構建了轉喻認知模型。Lakoff & Turner (1989) 認為轉喻是一種概念映射。Langacker (1993) 認為轉喻由相對突顯的原則提供理據, 他將轉喻視為參照點現象, 其基本觀點可概括為「高度凸顯的實體作為認知參照點喚起其它不那麼凸顯的實體, 說寫者或聽讀者以概念域中其它成分提供的背景同另一個概念實體進行概念接觸」(張輝、盧衛中, 2010:14)。認知參照點建立語境, 為不凸顯的概念成分產生概念可及, 從而達到意義建構之目的。

Croft (1993) 以認知域矩陣來定義轉喻, 認為轉喻涉及認知域矩陣 (domain matrix) 中的一個主要認知域和一個次要認知域, 是二者的相互突顯, 而不是相互映現, 轉喻的功能就是使字面義中的次要認知域變成主要認知域。Radden & Kövecses (1999) 以 ICM 為理論基礎, 認為轉喻是「一個認知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 一個概念實體或載體為同一 ICM 內的另一個概念實體或目標提供心理可及。」Barcelora (2000) 將轉喻定義為一個認知域向另一個認知域的概念映射, 兩個領域都包含在同一領域內, 認知域內的映射源域為靶域提供心理通道。後來他 (2003) 將轉喻進一步論述為同一個總的認知域內一個 (次) 認知域 (即源域) 向另一個 (次) 認知域 (即靶域) 的映射, 從而在心理上激活第二個 (次) 認知域 (張輝、盧衛中, 2010:32-33)。

認知語言學強調語言和認知的體驗性。轉喻自然具有其體驗基礎。王寅 (2007:250) 指出, 轉喻主要是基於對各種「事件域」的體驗和認知之上形成的: 人們在對事件域中各行為要素和/或事件要素的認識基礎上, 形成了知識塊, 儲存於大腦之中, 知識塊的各要素相互關聯, 交錯牽涉, 常常是牽一發而動其他部位或全身, 在思維中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轉喻現象。徐盛桓 (2009) 認為轉喻機理的核心是「本體是喻體」, 轉喻就是本體與喻體的外延內涵之傳承。該觀點揭示了轉喻的邏輯基礎。

這些論述儘管各有切入點, 但總體而言, 在認知語言學視角下, 對轉喻的特征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 第一, 概念化。轉喻是一種認知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通過與其他事物的鄰近關係來對某事物進行概念化; 第二, 鄰近性。轉喻基於鄰近性。認知語言學認為鄰近性不是語言結構內部或事物之間的相鄰關係, 而是概念層次上的鄰近關係; 第三, 突顯性。轉喻遵循一定規律, 判斷顯著度高低有一定的與我們的認知方式有關的規律可循; 第四, 偶然性。轉喻對語境有很強的依賴性, 往往根據話語發生時的語境臨時生成, 其來源義與目標義之間的關係是偶然的, 沒有概念上的必然性 (江曉紅, 2011)。

基於以上研究, 概念轉喻可以界定為: 以涉身體驗為基礎的人類基本的認知方式, 其運作機製是在同一個認知域 (ICM) (或稱認知域矩陣) 內, 一個相對凸顯的 (次) 認知域 (即源域), 向另一個和它具有鄰近性或相關性且相對不凸顯的 (次) 認知域 (即靶域) 的映射, 旨在為第二個 (次) 認知域提供心理可及性並凸顯 (次) 之, 最終達到傳遞其所承載的概念和意義之目的。

## 二、作為翻譯策略的轉喻

既然概念轉喻觀揭示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普遍規律, 即通過相對凸顯的事物或概念去認識與之相關或相鄰的事物或概念, 它就「使我們能夠通過相關聯的它事物來對該事物進行概念化。換言之, 概念轉喻不僅為語言提供結構, 也為人們的思想、態度和行為提供結構」(張輝, 盧衛中 2010:148)。從概念層面而言, 既然轉喻是在一定的認知域中, 用 A 代替 B (A stands for B), 在該轉喻得以實現的語境中, 二者在意義是等值的。這和翻譯有可類比之處。

翻譯的本質特征在於尋求譯文與原文意義的對應。翻譯實質上是「語際的意義轉換」(劉宓慶, 1999: 6)。「翻譯首先涉及到的是意義」(郭建中, 2000:277)。Newmark (1981:47) 提出了語義翻譯法, 指「在譯入語語義和句法結構允許的前提下, 盡可能準確地再現原文的上下文意義。」總之, 意義再現是翻譯的核心。

翻譯之所以為翻譯而非創作,是因為有原文及其意義的存在。因此,原文意義的再現是由翻譯本質決定的。「自古以來的翻譯主張就基本上是求信求達的」(王克非,1997:6)。者翻譯時首先對比源語與譯入語的各種語義潛勢,解碼原文信息,確定譯入語符號,使之所承載的意義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意義,實現意義的忠實再現,也即是實現翻譯的信達目標。就翻譯過程而言,其順序是:閱讀原文,把握意義,據意翻譯出譯文,可以表示為:原文→意義→譯文。而就某一具體譯文尤其是較理想的譯文而言,可以認為,原文和譯文表達了相同的意義,換言之,相同的意義用原文和譯文兩種語言來表達,可以表示為:原文←意義→譯文。但是兩種語言具體的表述方法常常有同有異。

請看英譯漢實例:

3a. Action and foresight will be needed as well as brightness and ambition.

不但需要很聰明和有抱負的人,而且需要有遠見卓識的實幹家。(連淑能,2010:178)

3b. A good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良心過得去,睡覺才安穩。

3c.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箭雙雕。

3d. He spoke with firmness, but his face was very sad and his eyes at times were dim.

他講話時,態度堅決,但面帶愁容,時而眼神黯淡。(連淑能,2010:177)

3e. He waited for her arrival with a frenzied agitation.

他等著她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連淑能,2010:179)

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提出了二十三種轉喻模式,下面結合其中部分模式以及他們未列舉但廣為接受的模式,對以上實例加以分析。例(3a)中的「Action」(行動)被譯為「實幹家」,同例(2a)相反,用「行為者」表征「行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同時兼有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兩種身份。既要閱讀、體驗和理解源語文化中的事物或概念,又要站在譯文讀者角度思考譯文該如何表達才能讓譯文讀者正確理解原文意義。對於和原文一一對應的表達方式,如果譯文讀者不能理解或容易誤解,或者從語言角度而言不符合譯文表達習慣,譯者就不得不考慮轉換表達。方法之一就是選擇與這些事物或概念相鄰或相關且相對凸顯的事物或概念去表征它們。也即是通過相關聯的它事物或概念,對該事物或概念所表征的意義在譯文中進行再概念化。「a smoker」(抽煙者)和「抽煙」相關,「Action」(行動)和「實幹家」相關。據概念轉喻的運作機製,兩種情況都構成基於相關性的轉喻關係,都屬於「行動與參與者(ACTION & PARTICIPANT)」的轉喻模式。不可否認,這種再概念化的選擇也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而這更能體現這種認知方式在人們日常行為中的自發性。這種再概念化以表征原文所承載的概念和意義為目的,其基礎是鄰近性或相關性。該鄰近性或相關性為原文中的事物和概念提供心理可及,使借助於譯文來表征原文中的事物和概念成為可能。從上文論述的轉喻運作機製可以看出,這,就是轉喻。譯者是施喻者。原文中的事物或概念就是本體,譯文的表征就是喻體。這樣,轉喻就在兩種語言之間發生了。

同樣,例(3a)把「foresight」(遠見)、「brightness」(聰明)和「ambition」(抱負)相應地譯為「有遠見卓識(者)」、「聰明的人」和「有抱負的人」,則是用具有某品質或特征的人(譯文)來映射其品質或特征(原文)。兩種之間是具有相關性,前者為後者提供心理通道,屬於「特征與實體(CHARACTERISTIC & ENTITY)」的轉喻模式。例(3b)和(3c)是成語,其翻譯也是廣為接受的。例(3a)中「a soft pillow」(柔軟的枕頭)是「睡覺安穩」的重要條件,具有相關性。而例(3b)中「birds」(鳥)和「雕」之間構成「上位與下位(HYPONYM &

HYPERNYM) 的轉喻模式。例(3d)和例(3e)中抽象名詞「firmness」(堅決)和「frenzied agitation」(狂亂的焦慮不安)在翻譯時被具體化為「態度堅決」和「熱鍋上的螞蟻」。它們對應地構成「抽象與具體」(ABSTRACT & CONCRETE)的轉喻模式。

再看漢譯英實例：

4a. 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

By his wife, Nee Chia, he had a daughter Tai-yu just five years old. Both parents loved her dearly. (楊憲益、戴乃疊譯)

4b. 一面說，一面讓兩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閑談漫飲，敘些別後之事。

The two men then proceeded, between leisurely sips of wine, to relate what each had been doing in the years that had elapsed since their last meeting. (Hawkes 譯)

4c. 晝趨行，夜趨行，敵偽關防穿插勤。

By daylight / By starlight / We penetrate hostile posts here and there. (陳毅《長相思·冀魯豫道中》，許淵沖譯)

4d. 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跑，連夜爬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不敢在去做。

Ah Q heard a great commotion break out on the inside. He had immediately taken to his heels, climbed over the city wall, and fled back to Wei Village, no longer possessing the nerve to continue in his new calling. (魯迅《阿 Q 正傳》，威廉·賴爾譯，見譚業升 2010)

如同上文(2b)把原文「鴉鵲無聲」譯為「utterly quiet」(寂靜)，(4a)中「愛之如掌上明珠」被譯為「loved her dearly」(深愛她)，在概念層面而言，原文是譯文的例示，它們對應地構成「抽象與具體」(ABSTRACT & CONCRETE)的轉喻模式。例(4b)把「閑談漫飲」譯為「between sips of wine」(小口飲)，用飲酒的方式來表征行為場景，屬於「次事件與複雜事件(SUBEVENT & COMPLEX EVENT)」的轉喻模式。例(4c)中「晝」和「夜」被譯為「daylight」(日光)和「starlight」(星光)，屬於「特特征與實體(CHARACTERISTIC & ENTITY)」的轉喻模式。例(4d)中「跑」被譯為「take to his heels」，利用身體部位「heels」(腳跟)來表征其功能「跑」，屬於「實體與功能」(ENTITY & FUNCTION)的轉喻模式。這些漢譯英實例同樣也都是通過一個次認知域(譯文)為與之具有鄰近性或相關性關係的另一個次認知域(原文)提供心理可及，從而到達表達後者的目的，翻譯過程中同樣是轉喻這種認知方式在發揮作用。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討論的是翻譯過程中所可能運用的轉喻認知方式，而不是轉喻的翻譯。原文可能運用了轉喻也可能沒有運用。原文運用了轉喻也未必運用轉喻策略來翻譯。為此，本文所選上述實例原文，通常都不被認為是轉喻，以和轉喻的翻譯問題加以區別。這樣做是建立在避免將轉喻研究泛化(姚嵐, 2005, 2009)的基礎之上的。因為根據 Radden & Kövecses (1999) 的語言本質轉喻觀，即語言在本質上是轉喻的，或者按照言語行為為轉喻(Thornburg & Panther 1997; Panther & Thornburg 1999)的觀點，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即「所有的編碼行為皆屬於借代(即轉喻)性言語行為，都是以明示的概念的信號借代(轉喻)隱含的概念，字面顯示的概念和推論出來的概念構成以此代彼的借代(轉喻)關係」(蔣勇, 蘇曉軍 2000)。這勢必導致「如果對轉喻研究採取一種方法，其結果是這種方法能夠描述如此眾多的不同現象，那麼這就不再是一種轉喻理論，因為該術語原來的涵義幾乎蕩然無存」(Haser, 2005:41)。

那些通常被認為未運用轉喻表達的原文，在翻譯過程中可能運用轉喻思維方式來建構譯文。這種現象可以解釋為，對於要傳遞的意義，原文作者和譯者根據涉身體驗進行了相關但不同的識解，加之兩種文化和

語言習慣的影響,採用了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而兩種方式之間構成了概念轉喻關係。未運用轉喻表達的原文,可能含有隱喻表達,也可能不含。其中對於不含隱喻的句子,可能會在譯文中基於語言抽象圖式和具體例示之間的關係(譚業升,2010),而用某一具體例示來加以說明,從而形成轉喻。而用某一具體例示來加以說明,從而形成轉喻。而該轉喻在譯文更大範圍內來看,則表現為隱喻。如例(3e),「a frenzied agitation」是一種抽象圖式,而「熱鍋上的螞蟻」則是具體例示。二者在翻譯過程中表現為一種轉喻的施喻行為。而觀察整個句子,可以看到其含有「他像熱鍋上的螞蟻」的隱喻表達。這也證明了「轉喻是隱喻的基礎」、「隱喻中埋藏著一些或更多的轉喻」(Grady, 1998; Kövecses, 2002)、「隱喻往往有轉喻誘發的」(Barcelona 2000; Dirven & Pörings 2002; Panthe & Radden 1999)等這樣的結論。

對於含有隱喻的原文,則涉及隱喻的翻譯問題。翻譯方法包括直譯法、意譯法、換喻法等。其中所謂意譯法,就是放棄原隱喻形象,而用非形象性語言把原文信息和內容表達出來。局部來看,就形成了具體例示向抽象圖式的轉換,如例(4a)「愛之如掌上明珠」是一種隱喻表達,含有具體意象例示,而譯之為「loved her dearly」,屬於一種抽象圖式表達。二者在翻譯過程中表現為轉喻行為。這同樣證明了「轉喻是隱喻的基礎」的結論。

從譯文角度來考察,譯文讀者可能並不被認為它們是使用了轉喻表述,如例(2a)-(2b), (3a)-(3e)、(4a),也可能仍然能看出是運用了轉喻表述,如例(4b)-(4d)。對於後者,能看出例(4b)中用「between sips of wine」來轉喻「during the dinner」;例(4c)中用「daylight」和「starlight」來轉喻「day」和「night」;例(4d)用「take to his heels」來轉喻「run」。但把翻譯結果和原文對照來反觀翻譯過程,可以看到譯者在翻譯時事實性地採取了施喻行為。而受喻者,即譯文讀者,則通常只是看到了源域,並據此能動識解,理解原文作者要表達的意義,從而達到翻譯之目的。

### 三、從翻譯看概念轉喻

認知來源於現實實踐,語言是體驗和認知的結果。就翻譯而言,體驗和認知先於並伴隨著翻譯活動,譯者對原文意義的理解是以體驗和認知為基礎的,因此譯文同樣是體驗和認知的結果(王寅,2005a)。王寅(2005b)提出了翻譯認知觀,認為「翻譯是一種認知活動,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多重互動為認知基礎的,譯者在透徹理解源語言(含古代語言)語篇所表達出的各種意義的基礎上,盡量將其在目標語中映射轉述出來,在譯文中應著力勾畫出作者所欲描寫的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可見,體驗性認知是不同語言間具有互譯性的認知基礎,也是轉喻思維方式在翻譯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發揮作用的認知基礎。

轉喻是概念層面的問題,因此稱為概念轉喻。概念是思維的基本要素。對於概念和意義的關係,不同學者有不同觀點。Jackendoff (1985)和Cook (1994:91)認為概念和意義可互相交換使用。王寅(2007:92)指出:「認為概念和意義可互相交換使用」後者比前者更為寬泛,所含範圍更為寬廣」之外可以通用(拋棄傳統上對概念所作的客觀主義的鏡像觀、靜態觀),應為範疇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概念的形成過程,也是意義的形成過程,它們幾乎是同時的。其實,這也與Langacker將意義等同於概念化(強調其主觀性、動態性)的觀點是一致的。」人們是用概念進行思想的,不同民族用語言表達概念的方式會存在差異。相同概念可以用不同語言形式來表達。有學者指出「意義是任何自然語言均可由各自系統中的語言符號導引出來的共有層面,但不同語言導引相同或相似的意義時不僅符號本身各異,而且所需的符號量也存在差異」(汪立榮,2006)。換言之,相同或相似的意義在一種語言中可能需要借助於某概念來表達,而在另一種語言中可能需要與該概念鄰近或相關的概念來表征,因此會表現出不同的語言形式。

在翻譯過程中,以意義信達為目標,就很可能依據認知規律採用轉喻這種思維方式,轉喻成為一種翻譯



策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具有的轉喻認知思維方式也同樣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發揮作用。這樣,轉喻的研究範圍就拓展到某些翻譯過程之中。基於此,本文提出「跨語言轉喻」一說,認為在翻譯過程中轉喻可以在不同語言間發生,施喻行為可以作為一種翻譯策略,來處理某些翻譯問題。這一點國內學者也有說論述,比如文旭、肖開容(2019:44-47)也有所論及,「在翻譯過程中,作為一種認知機制的轉喻也是一種翻譯策略」。但其落腳點是放在了轉喻的功用層面,而不是對這種類型的轉喻的認識。作為認知機制的轉喻所形成的翻譯結果和原文中所表達的內容之間事實上形成了一種轉喻關係,這種概念性的關係在語言表征上是跨了兩種語言的。譚業升(2020:3)在談論翻譯的認知過程研究時,認為其主要目標是「描述和解釋翻譯過程中的心理過程的發生和運作機制,擴展現有的認知科學模型,以描述可能有助於解釋譯者行為和選擇的過程」。其目標指向的是解釋譯者的翻譯過程。與他們不同的是,本研究是從已有的翻譯事實,反推翻譯過程,關注譯者認知活動的過程(侯敏,2012:18)。也就是說,這種翻譯實踐體現的是譯者的概念轉喻認知方式,落腳點是翻譯過程中體現的認知轉喻。正如有學者(邢嘉鋒,2018:144)指出的:「認知翻譯學研究的興起與發展得益於認知科學、認知語言學……等的發展,同時又反過來促進這些相關學科的發展」。本研究可以說是基於翻譯的認知語言學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對概念轉喻研究在語言學範圍內的拓展。

#### 四、結語

概念轉喻作為一種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本質上是超越語言層面的,具有跨語言性。但在認知語言學框架下,其表征離不開語言。本文針對已有研究討論轉喻局限在單一語言中,且轉喻目標常常無語言表征的情況,從翻譯結果反觀翻譯過程,指出在某些翻譯過程中存在著轉喻的施喻行為,轉喻的源域和靶域用兩種不同語言的表征:源域用譯語表征,而靶域用原語表征。這種體現為翻譯策略的轉喻,是轉喻這種人類認知能力在兩種語言關係中體現。這種跨語言表征的概念轉喻是概念轉喻的一種特殊表征形式。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並非要證明轉喻的施喻行為在翻譯過程中的普遍性,而是指出這種行為在一定範圍內是存在的。注意到這種特殊轉喻的存在,有助於深化對概念轉喻的認識。

#### 注釋

- ① Panther, K. U. & Radden, G. (1999).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② Barcelona, A. (2000).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rlin,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31-58.
- ③ Dirven, R. & Poring, R. (2002).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④ Panther, K. U. & Thornburg, L. (2003).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⑤ 束定芳:《隱喻與轉喻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 ⑥ Ruiz de Mendoza, F. & Campo, J. L. (2002).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Granada: Editorial Comares.
- ⑦ 張輝、盧衛中:《認知轉喻》,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頁 14,32-33,32-33,148。
- ⑧ Littlemore, J. (2015). *Metonymy: Hidden shortcuts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CUP.
- ⑨ 張煒煒:《隱喻與轉喻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20 年版。
- ⑩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⑪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⑫ Lakoff, G. & Turner, M.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⑬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38.
- ⑭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335-370.
- ⑮ Radden, G. and Kövecses, Z. (1999). Toward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Panther, K. U. & Radden, G.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7-59.
- ⑯ 王寅:《認知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頁 250。
- ⑰ 徐盛桓:《外延內涵傳承說——轉喻機理新論》,《外國語》2009 年第 3 期,頁 2-9。
- ⑱ 江曉紅:《轉喻研究述評:認知語言學視角》,《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11 年第 2 期,頁 119-124。
- ⑲ 劉宓慶:《當代翻譯理論》,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1999 年版,頁 6。
- ⑳ 郭建中:《翻譯中的文化因素:異化與歸化》,《文化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2000 年版,頁 277。
- ㉑ Newmark, P.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 ㉒ 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 ㉓ 連淑能:《英漢對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頁 177-179。
- ㉔ Peirsman, Y. & Geeraerts, D. (2006).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269-316.
- ㉕ 姚嵐:《ICM 對借代研究的消極影響》,《外語學刊》2005 年第 5 期,頁 86-90。
- ㉖ 姚嵐:《借代認知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當代語言學》2009 年第 4 期,頁 323-334。
- ㉗ Thornburg, L. & Panther, K. U. (1997). Speech act metonymies, in Liebert, W. A., Redeker, G. and Waugh, L. (Eds.). *Discourse and perspectiv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5-219.
- ㉘ 蔣勇、蘇曉軍:《從 Thornburg & Panther 的言語行為借代理論看言語的借代功能》,《外國語》2000 年第 3 期,頁 12-17。
- ㉙ Haser, V. (2005). *Metaphor, metonymy, and experientialist philosophy: Challenging cognitive semantic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㉚ 譚業升:《轉喻的圖式——例示與翻譯的認知路徑》,《外語教學與研究》2010 年第 6 期,頁 465-471。
- ㉛ Grady, J. (1998). The conduit metaphor revisited: A reassessment of metaphors for communication, in Koenig, J. P. (Ed.).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Bridging the gap*.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 205-218.
- ㉜ Kövecses, Z. (2002). *Metaphor: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㉝ 王寅:《語言的體驗性——從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看語言體驗觀》,《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 年第 1 期,頁 37-43。
- ㉞ 王寅:《認知語言學的翻譯觀》,《中國翻譯》2005 年第 5 期,頁 15-20。
- ㉟ Jackendoff, R. (1985).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MA.: MIT Press.
- ㊱ Cook, G. (1994).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Oxford: OUP.
- ㊲ 汪立榮:《隱義顯譯與顯義隱譯及其認知解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3 期,頁 208-215。
- ㊳ 文旭、肖開容:《認知翻譯學》,北大大學出版社 2019 年版,頁 44-47。
- ㊴ 譚業升:《翻譯認知過程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20 年版,頁 3。
- ㊵ 侯敏:《認知視閥下的語言與翻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2 年版,頁 18。
- ㊶ 邢嘉鋒:《認知翻譯學:理論與應用》,蘇州大學出版社 2018 年版,頁 144。

(Editors: LI Robing & Bonnie WANG)